

我所認知的孫中山先生

新 亨 萃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歷四十年，半生在海外，艱苦奮鬥；組黨、宣傳、領導起義，百折不撓，終於推翻滿清，創立民國。隨後討袁、護法，打倒軍閥，致力於國家的統一與建設，並力謀中外不平等條約的取消，豐功偉績，史不勝書，舉世景仰。

四次國外革命旅行

孫先生在十四歲時便首次隨母親楊太夫人到檀香山，在當地外文學校就讀，十八歲（一八八三年）才返國，赴香港拔萃書院肄業，其間應胞兄德彰先生之召，再度赴檀香山。返國後先後在廣州香港專攻醫學，畢業後即懸壺濟世，並鼓吹革命，到了二十九歲，他為着組織革命團體，推進革命工作，開始他的四次國外革命旅程：

第一次：是他在民前十八年（一八九四年），到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民前十七年（一八九五年），又在香港設立興中會總部，就近策動廣州起義，失敗後赴日。民前十六年（一八九六年）轉赴美國舊金山、紐約等地致力聯絡洪門會和致公堂，策動他們參加革命工作。同年行抵倫敦，不幸蒙難，一度被清使館誘禁。獲救後，他繼續在英國研究，並考察歐洲政治。同時，完成他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民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由英經加拿大再返日本，聯絡該國朝野人士及各會黨首領，以爭取對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此後，他便往返於日本及南洋間，在各地創辦報刊，

鼓吹革命，聯絡會黨，擴大革命力量，並策劃國內革命起義。

第二次：是在民前九年（一九〇三年），孫先生由日本再到檀香山，對保皇黨作思想上的論戰，並加入洪門致公堂，從事改組該堂工作，使之合乎革命需要。民前八年（一九〇四年）抵舊金山，改組大同日報，為消除保皇黨謬論而奮鬥。同時分赴美國各埠，倡導洪門會的改組，以增厚革命實力。是年十一月由美赴歐，在布魯塞爾、柏林、巴黎等地，先後成立革命組織，歐洲各地留學生紛紛加盟，民前七年（一九〇五年）六月抵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被選為總理。自此時到民前四年（一九〇八年），孫先生又奔走於日本、越南、星、馬、香港各地，先後策動黃岡、惠州、欽州、鎮南關、河口多次起義，雖均不幸失敗，但革命勢力已日益壯大。

第三次：民前三年（一九〇九年）夏，由南洋抵歐至北京、倫敦各地聯絡同志；同年冬赴美國，在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地，先後成立同盟會分會。民前二年（一九一〇年）再抵檀香山，當他抵達時，僑胞除表示熱烈歡迎外，還紛紛加入同盟會，革命勢力因此更形強大。是年五月抵日本，因清政府干涉，使他不能居留，乃轉赴南洋，在檳榔嶼召集同志，籌商募集經費，準備在廣州大舉起義。

第四次：民前二年（一九一〇年），因南洋

各地當局都拒絕孫先生前往，乃轉赴歐美各地籌款。民前一年（一九一一年），雖黃花岡之役不幸失敗，但革命聲威，已震驚全國，孫先生乃續在美聯絡各方，抵丹佛時，獲悉武昌起義成功，便立即轉赴英國及法國，從事國民外交工作，要求英國政府止絕清廷借款，獲得成功。並獲晤法國內閣總理等，達成任務。這些對於後來英、法等國承認我們革命政府，都是很有助力的。民前一年（一九一一年）底返上海，於民國元年一月二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記述行誼三篇文獻

孫先生半生在海外，四度周遊各國，並不是為着享受旅行觀光的樂趣，而是實實在在為着創立革命組織，宣傳革命主義，他歷盡險阻，艱苦備嘗。像孫先生一生這樣偉大的事蹟和歷程，以及他做人處事治學的精神，實在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述說。

許多革命前輩，對孫先生的生平已有精闢的講述，我覺得其中三篇是最值得我們去恭讀的。現在先就其發表次序，略為介紹：

第一篇，是吳稚暉先生所講的「總理行誼」。這是民國二十八年在重慶復興中央訓練團講的。當時我是該團教育委員會的主任秘書，為了陪侍吳先生也就列席聽講。吳先生對孫先生有深切的認識，孫先生對他也甚為敬重。孫先生在美國獲悉武昌起義成功後，立即赴倫敦從事外交工

作，他抵倫敦後第一個要探訪的便是吳先生。吳先生在他所講的「總理行誼」中指出：「總理品格自然偉大，度量自然寬宏，精神自然專一和研窮自然精博。」他對每一方面都引用許多他親知的事例，以證明孫先生的為人處事，絕無矯揉造作，而純出於自然。他認為：「總理是天生的一個偉人——一個天生創造主義的黨魁。」這實在是萬分恰當的。其次，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這本書刊行於民國十四年，闡揚孫先生思想至為精闢。他把孫先生的幾本重要著作，如民權初步、孫文學說、軍人精神教育、三民主義與實業計劃等，逐一作扼要的說明。認為：「先生（指孫先生，下同）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繼往開來的大聖。」先生的智識，包括近代最新的科學，而其解決一切問題，必用近代的科學方法。」「先生一生努力，全在以革命為手段，救國救民，打破一切個人主義的迷夢，實現三民主義。」「先生的全人格以仁愛為基本，一切表現無不為仁愛。有過人之智，而其智唯用於知仁；有過人之勇，而其勇唯用於行仁；可知離却仁愛，絕無革命可言。」因此，他總括的指出：「先生是真實的革命家，注重實行，不務空想，所以是真正的博愛主義，大同主義，而同時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我覺得戴先生對孫先生革命理論的瞭解，是非常深刻而正確的。

再次就是先總統蔣公在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所發表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其中有兩點非常重要的昭示：「國父以三民主義肇啓我中華民國，為亞洲各民族開創民主自由之先河，實不止求我一族一國之利益，而乃以繼絕世，舉廢國，扶顛持危之精神，以發揚我國民革命『天下為公』之大道也。」二是：「國父不獨為締造我中華民國之聖哲，實為復興亞洲民族之導師，而又為救人救世指引人類同趨於三民主義『大同世界』之先驅。」這充分說明了孫先生的偉大與一生奮鬥的目標。

三次機會恭聆訓誨

上述三篇重要的文獻，把孫先生生平不朽的言行，足供我們效法的，都已包括無遺。這樣我們實在沒有什麼需要補充的了，況且我生也晚，孫先生建立中華民國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九歲的小孩子，沒有機會直接追隨孫先生參加革命工作。好在我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就學的時候，孫先生已到了廣州領導救國建國大業，我幸而先後有三次機會親聆孫先生的訓誨。現在，我簡單的略為恭述：

我第一次謁見孫先生，是民國十二年在廣州大元帥府。當時因為廣東駐軍截留稅收，政府財源短絀，教育經費不能按時發放，積欠各校教職員薪金，各校教職員遂聯合罷教。學生為了支援教職員的行動，便推派代表向大元帥府請願。我是廣東高師的學生代表，和其他學校代表，一起到大元帥府去求見大元帥。執事人員領我們進入一個會議廳，大家圍坐在一個橢圓形的會議桌上。很快，孫先生便出來接見我們了。他穿着長袍，神采奕奕，態度非常慈祥，大家見了，都為他的氣度所感召，很自然的站起來鞠躬致敬。後來聽吳稚暉先生講「總理行誼」，說到他和孫先生首次見面經過：在未見面之前，以為孫先生不外是個「草澤英雄」，後來聽鈕惕生先生說：「他是一位溫文儒雅，氣宇偉大的紳士」，直到在倫敦見面時，才使他「祇覺是偉大，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最為適當。」于右任先生記述他初謁孫先生的情形也說道：「孔子稱老子『猶龍』，虬髯公稱唐太宗為『天人之資』，皆無以狀其偉大也。」我回憶當年印象也深具同感。我還記得孫先生入座後，便招呼我們坐下，當時我就坐在他的右邊，他很和藹親切的要大家

按序陳述意見，大家都慷慨激動地要求政府立即發放教育經費，好讓教員復教。孫先生耐心的聽完後，才懇切的答覆。大意是：「大家的意願，我很明白。你們重視學業的精神，值得嘉許。但是政府發不出教職員薪金，是由於一些不識大體的軍人，截留政府稅收。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使國家富強康樂，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剷除革命障礙。如果教職員一時仍不能復課，你們應該忍受一時的小損失，求取長久的利益。希望你們利用這一時機，到社會去參加革命宣傳工作，使軍人服從命令，將稅收交還政府，以解決大家的問題；同時號召民衆，幫助革命。大家千萬不可浪費時間，希望好好向各校教職員和同學說明這個道理。」孫先生這一段話，說得非常懇切，使大家聽了都心悅誠服，乃回校公開廣為宣佈，結果大家一致表示支持政府，老師們也瞭解政府的困難，立即復課。康德黎先生記述孫先生文中曾說：「他是一位天生富有感召力的人，不論在手術臺或沙場上，能令人心甘情願地隨時準備替他效勞。他有一種不可解釋的潛勢力，一種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吸引人們與他同道。」我回憶第一次敬聆孫先生言論的情景，確有相同的感受。而孫先生的氣度和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實來自他偉大崇高的人格，正如菲律賓獨立志士彭西記述孫先生文中所說：「他偉大人格的本質，是謙遜、平易、質樸……他不偏激，用和藹親切的態度，闡揚他的思想；同時以最善意的心情，和顏悅色地答復反對者的質詢。」吳稚暉先生也說：「總理一生，苦口婆心，見人即滔滔不絕地指示他的主義，然而祇樸實的抒其意見，絕不肯用手段，見一人說一樣話。」所以，他對學生們也一樣一樣的耐心聽取意見和坦誠的闡明革命的理想和當前的困難，無時無刻不以實現主義，完成革命為念，也隨時隨地爭取羣衆對主義的信仰，態度又是那樣誠懇自然，難怪凡和他晤談的人，都為他所感

召，而對他偉大崇高的人格有無限的景仰。第二次恭聆孫先生訓話是民國十二年十月，全國學生聯合會評議部，在廣州舉行全國學生評議會的時候。我當時是廣東高師學生會的評議部長，為當然的評議員，便以全國學聯會評議員一分子的資格參加會議。當時全國學聯會的立場，並不完全同情廣州的革命政府，因而會場還是掛「五色旗」和唱「卿雲歌」，來自全國各省的代表，思想更不一致，會中言論還很紛歧。但孫先生到會場致詞時，他慈祥仁藹的風采，便受到全場的尊敬。他的訓話完全是站在教育家的立場，向學生多方面警解和開導，充分表現了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風範。他首先鼓勵學生要以國事為己任。他說：「學生是讀書明理的人，是指導社會的，若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苟且從俗，隨波逐流，那就無貴乎有學生了。」接着他坦白指出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都是錯誤的，大會言論和宣言也不完全正確。（他的講詞記錄，後來以「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為題，列入國父全集。）當時大家聽了都深切感受到一份師長的關愛，而一再報以熱烈掌聲，大會立場也因此便趨堅定，支持革命，成了主導的力量。

孫先生對青年學生有這樣大的感召力，全由於他對青年的自然關切和愛護。他認為青年是革命先鋒和主力，也把青年視為他的子弟，而表現很自然的慈愛。先總統蔣公曾說：「總理一生的人格和精神，完全以仁愛為基本，無論待人接物，莫不充分表現仁慈博愛的精神。因此總理有過人的智勇，唯用之於救國救民的。」這一份仁愛的光輝，便是他感人的、不竭的能源，而對他那慈祥博愛的胸懷和熱烈的教化力，有無限的景仰。第三次恭聆孫先生演講三民主義，則開始於民國十三年一月。孫先生自撰著孫文學說（心理建設）、實業計畫（物質建設）、民權初步（社會建

設）各書以後，便從事於三民主義的著作，但未完成就不幸毀於陳炯明叛變之役。因此，他在進行中國國民黨改組時，便在我的母校——國立廣東高師禮堂演講三民主義，以為救國建國的「宣傳課本」。我在前一年（民國十二年）剛由鄉校長海濱先生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聽說孫先生來校演講三民主義，自然不願放棄這大好時機，而成為基本聽眾之一。孫先生是由一月二十七日起，每星期一次，在星期日到校演講，計講了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便停了三個多月，到八月三日才開始講民生主義，但祇講了四講，便因北上中止，原來準備到北京後再續講。據黃昌毅先生記述，還未講的，尚有四講，一講是居，一講是行，一講是民生主義總論，另一講是三民主義總論。不幸孫先生北上後，便一病不起，使這一不朽的講演未能完成，現在我們所讀的三民主義，祇是一本經孫先生核定而未全部完成的講詞。幸而有總裁續撰民生主義音樂兩篇補述，才稍補其缺憾。孫先生每次到校講演，禮堂的樓上樓下，都坐滿聽眾，甚至四周都站滿了人。他演講時態度從容，聲調鏗鏘，運詞顯豁，條理明晰，而且採用古今中外的學說和各種具體事物與科學技術，來印證自己的理論。自始至終侃侃而談，使聽眾都聽得入神，沒有人中途退席；尤其是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孫先生講演過了我們飯堂開飯時間，大家仍然繼續聽講，寧願聽完後才去吃冷飯剩菜，也不願中途離席，可見孫先生講演的吸引力了。

詞句簡明體系完整

孫先生講演時，所用名詞都很簡單明瞭，但却很適切的表達了其中的奧義，好像他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民生主義就是發財主義」、「政治就是管理眾人的事」都很淺白易明，而其中道理却很深奧。他對演講後筆記的校閱

、訂正和印行都非常認真。如「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一句話，鄒海濱先生讀校時，覺得太簡單，便補充一段話來說明。孫先生看了後，認為意思雖然不錯，祇是文字不夠簡明，便親筆改為「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為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又海濱先生覺得民族主義原稿中有一段話，不太明白，便去問孫先生，孫先生問明是那一段後，便毫無考慮的將全段刪去。他說：「三民主義的學理雖然深奧，却要使凡識字的人，個個都能看得懂。如果大學校長都看不懂，便要全部刪去。」他隨時注意對方能否瞭解和接受，他的文字和講演自然富說服力了，所以大家稱他為天生的教育家。

孫先生學問淵博，好學不倦，即使奔走革命，無論到那裏都帶着許多書本，有些革命同志資助他川資，都拿來買書。先總統蔣公會說：「國父一生只要一日不看書，即皇皇如有所失。」而各種科學，他都涉獵研究，在香港讀醫科時，便熟讀二十四史，有同學會對他有所懷疑，加以抽問，他都能一一對答如流。邵元沖先生曾問他研究的是那一種學問？他答：「我所研究的是革命的學術，凡一切學術，祇要可以有助於我革命的知識和能力的，我都拿來做研究原料，而組成我的革命學。」馬林會問他革命的基礎是什麼？他答：「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承此道統，而加以發揚光大。」由此可見，孫先生的革命思想是以他博大精深學問為基礎而自成體系的。孫先生的革命思想，固以三民主義為中心，但他的著述體系却分為「心理」、「物質」、「社會」、「國家」四項建設。三民主義為國家建設之一部分，此外，尚有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及國防計劃等等，可見孫先生不但有他的革命理想和目標，更有實現

理想的具體規劃和方案。而三民主義的目的，不僅在「以建民國」，且在「以進大同」。今天，三民主義已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如先總統蔣公所說：「三民主義不獨是今天二十世紀的主流，而更加是這個黑暗混亂世界的指南車，是一切被奴役的國家和人民自拔於共產邪惡的聖火明燈。」更說明孫先生不但是我們思想的導師，也是世界人類思想之先知。恭聆孫先生宣講三民主義之後，使人深切認識一位思想先知的風範，而對他博大精深的學問，有無限的景仰。

以上憶述我三次親聆孫先生訓誨的經過和感受，雖然只是個人的經歷，但也可見孫先生人格的崇高偉大和他慈祥仁愛的胸懷，博大精深學問。孫先生的一生事業，可以拿四個字來說明，就是「國民革命」，他的一生可說是「為國民革命而生，也為國民革命而死」，而在他致力國民革命的歷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創造革命理論、建立革命組織和推進革命行動。在此短文中，自然不能詳為縷述，僅能分別略述其梗概，並舉一二事例，使大家對我們的國父——國民革命之父親導國民革命的艱苦歷程，有更深切的認識。

建立革命組織經過

首先，讓我們談談孫先生如何建立革命組織？因為孫先生領導革命，雖然先有革命理想，再建立革命組織，但革命理論則是在革命過程中不斷創立和發展，而革命組織也在革命過程中不斷成長和壯大。大家都知道，孫先生曾五次組織，其過程真是艱苦萬分。民前十八年，他二十九歲時開始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當時參加者祇有十幾人；翌年在香港設立興中會總部，加盟的知識份子仍然不太踴躍；後來，他親赴歐洲英、比、法、德各國，和美、日、南洋等地，宣導革命，鼓動知識份子積極參加，到民前七年他四十歲，在東京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時候，加盟的也

祇有三百餘人，隨後在美國各地成立分會，黨務才能逐漸開展。民國元年他四十七歲，由於滿清既倒，民國成立，同盟會遂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及國民公黨等四個團體，在北京合併組成國民黨。因此，份子較為複雜，意見漸趨紛歧。民國三年他四十九歲時，鑒於國民黨組織散漫，紀律廢弛，實不足以領導革命，開展工作，遂在東京完成中華革命黨的組織，重振革命精神，黨員必須宣誓：「附從孫先生」、「服從命令」。至民國八年他五十四歲時，認為要謀國家之統一與建設之推進，勢須集結國民之力，方克有濟，乃在上海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但名稱雖已更易，黨務仍未革新，乃於民國十三年在廣州召開該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黨的改組。

在歷次組織的歷程中，孫先生備嘗艱苦，他所遭遇的困難，最重要的是：敵人的掙扎、同志的動搖和民衆的冷漠。所謂敵人，就是滿清與助紂為虐的保皇黨和殘餘的北洋軍閥與幕後操縱的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孫先生幸能以不屈服、不妥協、不動搖和不氣餒的精神，堅守原則，百折不回，愈挫愈勇的奮鬥，盡力爭取一切力量 and 同情，使敵人孤立，而終於戰勝敵人。如民前十二年致書香港總督，力數清廷罪狀，及爭取臺灣總督兒玉和法國越南總督賴美之助力。一面接納國內其他會黨，以擴大自己陣營，如命史堅如、畢永年分別聯絡長江及湘鄂會黨。對同志之有所懷疑或意志動搖者，孫先生則動之以誠，導之以正，予以感化教育。尤其在民國成立後，革命黨人便有「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之說，更迷於「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謬論，認為孫先生的設計劃陳義過高，不易成功，孫先生為此乃著「孫文學說」列舉十證，來闡明知難行易的道理，實行心理建設，掃除心理大敵。他送次致力黨的改組，主要便是要鞏固自己，重整革命陣營。至於對

民衆來說，孫先生本「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宗旨，不放棄任何機會來為民衆服務，教育羣衆，使羣衆樂為同志，厚植革命力量。許多同志的參加革命，如四大寇的尤列、陳少白及馮自由與香港富商李紀堂等，都是在很偶然的機會中為孫先生所感召而參加的。馮自由先生曾自述他加入興中會的經過：當時在橫濱，他年僅十四，橫濱與中會成立，其父馮鏡如為會長，一日孫先生與陳少白、鄭士良在其家午膳，馮自由先生敬待末座，孫先生問他好讀何書？答：「好讀小說。」問：「好讀那一部小說？」曰：「三國演義。」問：「三國演義中，你最喜歡何人？」曰：「孔明。」孫先生說：「你既喜歡孔明，即明白古人順逆之理，余等之與中會便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之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等起兵驅逐滿洲，即孔明之六出祁山。」孫先生並對馮老先生說：「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令其入會？」鏡如老先生便命自由先生填表登記。可見孫先生組織，雖幾經艱難困苦，但都能堅苦奮鬥，始終不懈，故能不斷戰勝敵人，團結同志，爭取民衆，使革命組織不斷的發展和壯大。

革命理論四大建設

其次談到孫先生如何創立革命理論？前面說過，孫先生一生好學不倦，所研究的都是革命之學，平日手不釋卷，專志研究革命理論。他曾對鄒海濱先生說：「一般人讀書不認真，還不要緊，我們革命黨人讀書，却千萬不可不認真，因為一般人讀書，或是為個人的前途，或是為一家生活，他讀書不認真，成敗得失，只關係他個人或其一家。革命黨人則不然，一身負國家社會的重任，如果自己讀書不認真，事情做錯了一點，就不但害了我們的黨，連整個國家社會也被害了。」他甚至於倫敦時，旅費缺乏，有同志曹亞伯湊了三、四十英鎊資助他，他却拿去買書。所以，

孫先生的革命理論，均非空談，深具學理與實踐方法，也可以說是綜合古今，融貫中外，捨短取長的救國救世的最高理想。

孫先生的革命理論，究竟包含些什麼呢？孫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自序中說：「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余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可見孫先生的革命理論，實包括他對「心理」、「物質」、「社會」與「國家」四大部門的建設。

心理建設就是「革命須先革心」的「革心」工作，而革心首須堅定對革命的信心，上面說過的「孫文學說」就是孫先生針對一般誤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謬論而創立的「行易知難」學說。他開始立意撰寫是在民二年討袁失敗之後，但到了民八年才決定刊行，目的是在打破國人的錯誤心理。這是孫先生一個很偉大的創見，「孫文學說」的書名，是他親自想了許久才確定的，其中經過，胡漢民先生知之最詳，他說：「『知難行易說』是孫先生在學說上一個很大的發明，孫先生寫完這本學說的稿子後，好久沒有把書的名稱寫出來，甚至於連『知難行易說』的書名都不肯用。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就提筆寫『孫文學說』四個字，可見他對於『孫文學說』這部著作的自信力了。」我們也可以想見孫先生對此一學說是如何的重視了。

物質建設，就是實業計劃。這一計畫的原稿，孫先生當時是用英文寫成的，目的是讓外國人看得明白。後來由朱執信、廖仲愷諸先生譯為中文。全書共分六大計畫，包括了全國交通系統的建立，港埠的開闢，電力的發達，礦業、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如何積極造林、興辦水利，如何殖民邊區、解決人口問題，藉以鞏固國防等等問題

，都作了切實具體的規畫。這是孫先生針對中國的國情、人口、地理自然環境以及迫切的需要，精心研究而完成的一個最為具體的實業發展方案。

社會建設的基本工作，就是「民權初步」的刊行。這是孫先生的第一部著作，為於民國五年出版於民國七年，是專門講述開會方法的一本專書。孫先生認為民國之建立，目的在實行民主政治，民主國家的國民，首先要懂得行使民權；行使民權，必須從結合羣力的集會開始，所以他說：「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這就是說，孫先生認為我們要把國家建設為一個民主憲政的法治國家，便先要把社會建設為一個安定祥和的自治社會。

憲法制度政策要領

其餘就是國家建設，這一書包含甚廣，除三民主義為大家所知，我在上面也說及孫先生當年講演經過。此外，尚有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和國防計畫等共八冊。孫先生對於這些問題，雖未分別寫成專書問世，但在其他的遺教中，可以探求出一些輪廓或綱目。關於五權憲法，這是孫先生創立的一個政治制度。他說：「五權憲法的根據，老實說起來，就是我們研究各國憲法，獨自思想出來的。」大家要知道，孫先生認為各國的三權憲法不很完備，才創出這個五權憲法，想用來作為我們「國家建設的大機器」，也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具體方案。故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源，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是五權憲法對人民權利和政府組織規定的基本原則。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是一個思想的兩面，名為「民權」是重在人民有權，名為「五權」是重在政府有能，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是密切不可分的。孫先生說：「我們所主張的革命，就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革命。」所以他手訂的建國大綱

第一條便說：「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一般人忽略對五權憲法的研究，是大大不應該的。

對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孫先生雖未及寫成專書，但可在「建國大綱」和「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的遺教中，獲得一些原則、方法及實施步驟的提示。孫先生理想的地方自治團體，不祇為一個政治組織，同時也是一個經濟組織；非但在保民理民，並且要教養兼施，以同時實現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為目的。理想的制度，是以縣為自治單位來全面推動。所以在我們現行憲法中，對於地方制度的規定，確是以孫先生地方自治理想為基礎的，祇要切實推行，孫先生地方自治的理想，就不難實現。

關於外交政策：孫先生這一專書，雖也未能如願寫成，但實際上他已擬好目錄，這在孫先生民國十年覆廖仲愷和胡漢民兩先生的一封信中，便會列舉，共有二十四項，大致分別研究各國的外交政策，進而研究我國過去外交失敗的原因，和我國當前之危機，再而主張實行中國國民黨對外政策，以挽救我國外交之失敗，然後提出圖謀國家獨立之方法及將來之對外政策。孫先生還在原信中說明：「此書之思想及路線，一言以蔽之，求恢復我國家以前一切喪失土地主權和恢復人民自由平等而已！」先總統蔣公對孫先生此一外交政策，曾特別加闡揚，並特別指出孫先生所口述經朱執信先生執筆，在民國六年所發表的「中國存亡問題」一書，是孫先生外交政策精神之所在，認為這書無異是孫先生外交政策的藍本。可見孫先生當時苦心策劃的國家建設的外交政策，是如何的精密和周詳，而值得大家去作深入的研究。

關於國防計畫：國防計畫一書也和外交政策一樣，書未寫成，但也先擬有目錄，也是孫先生在民國十年給廖仲愷的信中所提出的，計共有六十二項。大致是研究國防的方針與政策，發展國

防工、農、礦、交通等計畫，發展海陸空軍建設計畫，軍制的改革與軍器的改良，抵禦各國侵略計畫的方略，實施全國精兵政策等等，可說都是爲着鞏固國防，保障國家的獨立和安全。

由上所述，可見孫先生革命理論之體大思精，它的目的，不僅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也要喚醒國際人士，共謀世界大同。

注重方略講求方法

至於孫先生的革命行動，民國建立前的十次起義和民國建立後的討袁護法等事蹟，都爲衆所共知，用不着多說。我覺得孫先生的革命行動，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是他的革命行動不僅在破壞以摧毀敵人，更重在建設以實現主義。而且他認爲革命的目的在建設而不在破壞。二是他的革命行動注重方略和方法，他每一時期都訂定革命方略，講求方法來推進他的革命行動，而不徒尙空談。以下我們試各舉一例來說明孫先生對革命建設和革命方法的重視：

關於革命建設，最明顯的事例便是孫先生在民國元年就任臨時大總統後，當時全國尚未統一，清廷還未退位，袁世凱更挾北方各省以自重，大局固未安定，而民國創立伊始，正是百廢待舉。孫先生在這複雜困難的環境下，就任只不過短短的三個月，却積極推進各項政治建設，完成了不少政治革新。第一、確立「公僕」的服務觀念：這是孫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工作上的一貫基本要

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責之觀念以言，則文所不敢辭也。」可見孫先生是以爲民服務作爲他的責任。第二、推進各項愛民措施：孫先生在臨時政府成立以後，便先後下令保障人權，禁止階級歧視，嚴申法紀，禁止官吏非法擾民，禁止販賣人口，禁絕販賣「豬仔」，禁止刑訊，禁止體罰，勸禁纏足。積極方面，則通令愛護僑胞，重視農事，切實賑賑等。可見得他對民間疾苦的關切和重視。例如他在禁止刑訊的令文中所指示「本總統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國難，二十餘載，對於亡清虐政，曾申其罪狀，布告中外人士，而於刑訊一端，尤深惡痛絕，中夜以思，情逾剝膚。」又在通飭各省辦賑的令文中說：「民國新造，首重保民；願以用兵之故，致滋失所之憂；本總統每一念及我同胞流離顛沛之慘象，未嘗不爲之疾首痛心，寢食俱廢也。」愛民深情，溢於言表。尤有進者，他在民國五年對駐滬粵籍參議員講「中華民國之意義」時，更強調：「願僕向有一重大的意志欲自於今日者，諸君知中華民國之意乎？何以不曰中華共和國，而必曰中華民國，此民字之意義，爲僕研究十餘年之結果而得之者。」更表示其對「民」是如何的重視。第三、推動非常建設，力行徹底革新：孫先生認爲革命的建設是非常的建設，必須全面和徹底推進，使人民耳目一新。例如他堅持廢舊曆行陽曆，否則不允就任大總統職。故他就任後對官制、軍制的建立，財政的整理，司法的建制等，都進行全面革新。不特此也，孫先生對個人的身心和日常生活也要求革新。他在「革命的基礎在深高的學問」的講詞中說：「要做革命事業，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可見孫先生對各項革新工作，都務求徹底的。第四、以身作則，堅定信念和堅持原則：孫先生當年

領導革命，有無比堅定的信念，對革命工作的推動，也都堅持原則。如對袁世凱之出任總統，便堅持可由民國推選，而絕不能出自清廷的遜讓，袁氏必須宣誓遵守憲法。又如當時關於政府組織問題，有主張採用總統制的，也有主張採用內閣制的。爲此問題，爭議頗爲激烈。孫先生乃說：「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以誤革命之大計。」此種大公無私，堅守原則的精神，真是令人肅然起敬。孫先生又說：「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這說明堅定信念之重要，真值得我們自策自勉。第五、注重效率和講求方法：孫先生在臨時政府的短短的三個月中，於動亂震撼之餘，盡力建立各項典章制度，無論官制、軍制、財政、司法、教育和地方行政，都粗具規模，充分的表現了一個新政府的氣象，這是孫先生注重工作效率和講求治事方法的成效。

關於革命方略和方法，大家都知道孫先生從同盟會開始，便訂定革命方略，對如何建軍、略地、因糧、安民都訂有詳細步驟。中華革命黨時期的革命方略更爲詳盡。其後手訂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等，都是革命的具體方略。這都爲衆所共知，不必多說，現在我只想舉一個孫先生最初提出的救國綱領，這可說是他最初的政治理想，來說明他早在組黨以前便已注重具體的方法，而不徒尙空論。

救國大計四大綱領

這便是民前十八年（一八九四年），孫先生還是二十八歲的時候，上書李鴻章，提出的建國理想和方法。這一文獻雖在孫先生生前便曾刊布，但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它的發現是在孫先生

逝世後，史學家顧頡剛得陳援庵先生的指示，才在上海基督教廣學會的「愛國公報」上找到。最初的原稿是刊發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和十月，愛國公報第六九及七〇兩號上，當時的標題是「上李傅相書」，並註明是廣東香山來稿。後來才陸續的在各種雜誌轉載，但標題則並不一致，「國父全書」則用「上李鴻章痛陳救國大計書」。我簡稱它為「國父的救國四大綱領」。這就是書中所強調的「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通常講這四句話，都忽略了一個「能」字，祇說「人能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實原文都還有一個「能」字的，這個「能」字非常重要，而且是深具意義。因為「人能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建國的四大目標，而救國的綱領，則在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暢其流」。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知道建國的目標，更要重視實行的方法。所以孫先生上書給李鴻章，不但告訴他：人要盡其才，地要盡其利，物要盡其用，貨要暢其流，而且還告訴他怎樣做才可以使「人能盡其才」，怎樣做才可以使「地能盡其利」，怎樣做才可以使「物能盡其用」，怎樣做才可以使「貨能暢其流」。可見孫先生是如何的重視方法了。孫先生所提出的方法是什麼？現在扼要的摘述：

首先就「人能盡其才」而言。孫先生說：「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關於教養有道方面，他提出七點指示：一、多設學校，使人人都能接受良好的學校教育，以啓迪知識、學習技能。二、學校教育要重視教育方法，採啓發式代替填鴨式，並善用科學儀器，輔助教學。三、實施量智施教，按人的才智能力，分科施教。四、學校培養人才，要因應時代需要，與社會需要相配合。五、學校培

養人才，要因應地域需要，如臨海地區，多設海軍學校；礦產地區，多培養冶礦人才。六、學校教育須通才與專才兼顧，以免偏枯。七、學校教育應講求實用，俾能學以致用。關於鼓勵以方來說，就是要善用獎勵的方法，因為人類天生才智不一，有上中下三等，上等才智的人，不待獎勵便會自動奮發，但中下等的人，需要藉獎勵來激發他，所以不特政府要有獎勵辦法，民間的各種學會等團體，也應該盡力去獎勵學術研究和培植人才。至於任使得法，孫先生主張要用考試的方法來選才，要用其所長，使各稱其職，各盡其能。這樣，便可做到「天無枉生之才，野無抑鬱之士，朝無倖進之徒」了。先總統蔣公說過：「中興以人才為本。」也就是這個意思。可見人是否能盡其才，關係國家政治的成敗，國運的興衰。

其次，就「地能盡其利」而言。孫先生說：「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農業與人民的生活，關係最為密切。所謂農政有官，就是要政府設置專管農事的機構，以從事水利的修治，荒地的開墾和教導農民耕作，以發展農業，改善農民生活。在農務有學來說，就是要政府設立農業專門學校和研究機構，以培養農業專才，並從事地質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和農業醫學的研究，以改進生產。至於耕耨有器，簡單的說，就是要耕種機械化，這不但可以節省人力，增加生產，而且可增加效率，減低成本。這三點都做到，便能使「百姓勤」、「樹畜精」、「人力省」。也就可做到地盡其利。

再次就「物能盡其用」而言。孫先生說：「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所謂窮理日精，就是窮理致用，萬物都是可用的，問題是怎樣去利用，這就要靠科學研究了。先總統蔣公曾說：「窮理以致其知，能知必能用。」便是這個道理。機器日

巧，很明顯的就是推廣運用機器以開發資源，我國地大物博，礦產儲藏豐富，如不運用機器開採，便使寶藏於地，不為我用了。至於不作無益以害有益，換句話說，就是節省物力，對有用之物，應善取善用，不要浪費，否則便不能使物盡其用。最後就「貨能暢其流」而言。孫先生說：「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無阻難，保商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這就是要振興商務，要振興商務，便要改善關卡制度，消除阻難，以免影響商運。對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必需謀求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外交關係，採取有效保護措施，使外銷通暢，商務日興。至於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很明顯的就是發展交通和運輸工具。孫先生對交通甚為重視，認為「交通為實業之母」。因為交通不振，便貨暢難求了。孫先生對此，更有明確的指示，他說：「商不見保，則貨物不能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則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何貴其多也？」他更舉一例說：「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之地，何以今貴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為之經營，為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為之維持保護也。」

上面所述的四大綱領，孫先生都指示了我們如何去達成的方法，也就是如何才「能」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在八十九年前，孫先生便提出這樣正確的思想與具體方法，真可說是高瞻遠矚了！直到現在他所指示的仍然是非常適切，也是我們當前努力目標。如果我們本着這些方法切實去做，自然會成功的。由此可知孫先生的革命，固有其遠大的目標和高深的理論，但也有其具體的方略和實行的方法，孫先生不但是革命的理論家也是革命的實行者。所以在他的領導下，革命組織不斷成長和壯大，革命理論日益健全和精深，革命行動也就一天天的蓬勃和發展了。

遺囑包含重要道理

但不幸孫先生在領導國民革命的過程中，革命尚未成功，便離我們而去。因此最後，讓我敬謹恭述孫先生的遺囑，來和大家共相策勉。關於國父遺囑，許多人都耳熟能詳，大家也知道，國父彌留時還不斷的發出「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呼聲。我們體會孫先生這幾句最後遺言：所謂「和平」並不是指和平方法，而是和平目的——革命的崇高目的，也就是世界和平。可是要救世界，使它能夠達到永久和平、世界大同的境界，愛好自由和平的民族，必須共同奮鬥；奮鬥的途徑和程序，必須從「救中國」做起，這就是「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救中國、救世界」的道理。孫先生的遺囑和救國救世的最後呼聲，何等深遠而偉大啊！先總統蔣公是對國父遺教研究最為透徹，闡揚最力，奉行最徹底的人。他在民國二十三年曾有過關於孫先生遺囑的訓示。他說

：「大家要知道，遺囑是總理指示我們救國的藥方。是扼要的指示我們革命黨員和革命軍人責任之所在與革命之基本途徑，我們每次紀念週之所在要隨聲朗讀，除紀念總理的意義外，就是要提醒我們大家革命的精神，反省過去，策勵將來：各位回去以後，在舉行紀念週時，再不要將遺囑當爲口頭禪，隨便敷衍讀過，而要切實研究明白，而且向一般部下解釋清楚，使他們都能很透徹的知道遺囑中所包含的許多最重要的道理……」我們恭聆蔣公這一重要訓示之後，應該反躬自問，有沒有把國父遺囑當爲口頭禪而敷衍讀過就了事呢？有沒有對遺囑的內容切實研究予以闡揚呢？有沒有把遺囑中摘要解釋清楚使能徹底明白奉行呢？誠心誠意，坦白檢討之後，我們會不會愧對先總統蔣公的訓示呢？我相信，甚至有些同志對建國方略究竟包括了什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爲什麼也要列入遺囑之內？也不一定瞭解的，因此，我們對於國父遺囑也要深入的

去研究體會才是。大家都知道孫先生也有遺囑留給他的家屬，內容是「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爲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如此簡明親切，更見得孫先生畢生公忠爲國，誠心救世，不及於私的至高無上情操，實堪爲國典範。以上所言，僅將個人對孫先生的認識和體驗，就思考所及，略爲述說，總之，孫先生畢生奮鬥的目的，在「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誠如先總統蔣公所說：「總理不獨是締結我中華民國之聖哲，實亦爲復興亞洲民族之導師，指引全人類同歸於三民主義『大同世界』之先驅者」，孫先生確實是一位博愛主義，大同主義，注重實行，不驚空想的偉大愛國革命家。現在革命尚未全部成功，我們要遵循孫先生指示途徑，效法他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力行先總統蔣公實踐國父遺教的訓示，在今總統經國先生領導下，爲反共復國而共同努力不懈。

中外文庫 貴州政壇憶往

何 輯 五 著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願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壹佰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